

第34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本月28日开幕,39台音乐舞蹈演出讲好中国故事

今年“上海之春”继续力推新人新作



本 报 讯
(记者 徐璐明)
第 34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将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8 日在上海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音乐节期间,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波兰、瑞士、英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的乐团、音乐家、舞蹈家们将奉上 39 台精彩纷呈的音乐舞蹈演出。

力推新人新作是“上海之春”的一贯

宗旨。作为新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音乐舞蹈节,“上海之春”先后打造了《红旗颂》《梁祝》《白毛女》等大批经典作品,培养了朱践耳、吕其明、何占豪、陈钢、俞丽拿、闵惠芬等优秀的艺术家。上海市音协主席、上海之春组委会副主任许舒亚告诉记者,本届“上海之春”将一如既往地扶持优秀的艺术精品和年轻的艺术家人才,推出一批首演新作及多台新人与新作专场演出,“文艺创新”的理念将贯穿音乐节的始终。“本届‘上海之春’推出的新人新作力求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得到质的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其中,音乐节开幕演出叶小纲的交

响组曲《敦煌》,为世界首演。另外一部首演的原创歌剧《汤显祖》,是根据“临川四梦”的内容创作而成的。原创品牌项目《海上新梦》已经在音乐节的舞台上连续举办十届,推出新作近百部。今年的“上海之春”将全面梳理总结十年的发展成果,从历届优秀原创新作品中遴选部分较为成熟的精品力作进行回顾演出。《谭盾与上海爱乐乐团音乐会》则是作曲家谭盾用西方交响乐技法来呈现中国敦煌古乐的意境。

本届音乐节将给予年轻艺术家充分展示的机会。《龚天鹏青少年主题交响乐作品音乐会》《栀子花开了——多媒体海

派民乐剧场》《上海民族乐团新人新作音乐会》等原创主题音乐会将成为 80 后、甚至 90 后展示专业实力和音乐梦想的舞台。《栀子花开了》还首次尝试与 VR 和网络直播平台结合,希望以跨界的形式吸引更多青年观众的关注。“音乐会上,仅上海音乐学院就将推出 36 部新作,16 位音乐人第一次出现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这样力推新人新作的力度,是往年所没有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之春组委会副主任林在勇说。

“在选拔、展示优秀新人新作的同时,用好中国元素、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自信是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

策划重点。”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上海之春组委会副主任尤存表示,本届音乐节新创“锦绣中华音乐会”板块,首度联合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等西南地区音协推出《魅力西南——优秀音乐精品荟萃》演出,通过民歌演唱、器乐、歌舞表演等形式集中展示我国西南地区的原生态音乐文化。届时,组委会还将邀请中华创世神话美术作品及文学创作者与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家展开“神话史诗”的对话,共享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内容策划将在各板块的内容中丰富呈现。开幕演出《中国故事》、闭幕演出《丝路追梦》等原创作品均以丝绸之路璀璨

悠久的历史文化为灵感,是古典音乐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民族艺术有机结合的艺术创新。

除了新人和原创作品集中亮相,本届“上海之春”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秀音乐、舞蹈家。《潘德列茨基与 SSO 音乐会》、《卡斯普契克演绎卢托斯瓦夫斯基音乐会》、《莎拉·张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及美国 Pearl Show 剧团的多媒体舞剧《春江花月夜·赛珍珠》等将一亮相,更彰显了“上海之春”作为国际性交流平台的高度,将为中西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让历史建筑“活化性再生”

■本报记者 许 旻
实习生 杨越童

近年来,城市更新中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生,愈来愈成为学界、业界探讨关注的焦点。日前在同济大学举办的“建成遗产:一种城乡演进的文化驱动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多名专家谈到,建筑文化遗产并非静态“凝固”的事物,倡导保护遗产的多样性和创造的多样性并重。

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是国际文化遗产界提出的概念,指以建造方式形成的文化遗产,由建筑遗产、城市遗产和景观遗产三大部分组成。此次“建成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建筑学会和同济大学共同主办,近 200 名来自世界多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知名教授、业内人士作了 10 余个主题报告及 40 多个分主题报告。中国建成遗产相关领域第一本英文学术期刊《建成遗产》同时创刊首发。

建筑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可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

不少学者认为,建筑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可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遗产保护与传承,一面是设计转化与创新。对于少数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建筑来说,单独作为保护对象是合适的,但对于大量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而言,则需考虑留存岁月风貌后,如何让开发匹配不同建筑体量、文化特征、历史脉络,重焕建筑活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参与了上海多处历史建筑保护项目。他说,近些年国内的大规模建设,对历史建筑造成了一定冲击,如今全社会意识到建筑遗产再生保护的重要性,使得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有学者以福建泰永庄寨为例,庄寨在开发修缮中,审慎考虑地域特征与文化风俗,摒弃了“一提及旅游民宿,言必称丽江大理”的局限性思维,避开了“土楼”旅游开发中业态同质化的弊端,凸显庄寨在闽东乡土文化中维系乡愁的据点角色。毕竟,建筑遗产的修缮不是为了把物质空间凝固在过去某一刻,也不是一锤子赔本买卖,而是应激发遗产中蕴含的文化凝聚力,重建地域认同,恢复乡村造血能力,才能更好实现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

融入当下城市文明与日常生活中

在业内人士看来,建筑修复保护并不仅仅是用一个栅栏将古旧景观和城市文明粗暴地分隔开,而是应根据建筑物特定的历史文化意义,使其融入当下城市文明与日常生活中,让历史建筑对话当下。

研讨会上,城市遗产保护的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杰分享了去年开业的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这一公共空间以原国营宇宙窑厂为核心启动区,既保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工业厂房、苏式风格锯齿状“包豪斯”厂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工业厂房等各具时代特色的典型建筑,又在老厂房基础上结合现代时尚元素翻新改建。经改造修缮后,如今老窑炉、烟囱、水塔依然耸立,成为众多游客寻找工厂记忆、感受城市灵魂的标志性建筑物。除了“怀旧”,这里也是年轻人就业创业、当地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在街区举办的美术展览、创意集市、动漫展等系列活动吸引全国多地同好者相聚切磋;夜幕降临时,三三两两居民在厂房外惬意散步。可以说,日常使用赋予了建筑遗产“活态”的生命、一种自我更新修复的能力。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遗产》主编常青看来,建成遗产是回顾过去的一个时空坐标点,它给予了人们身份和记忆的灵感源泉。“建成遗产不可复制,需要再生、活化,既有助于提高一个地方的社会名望和文化品质,又可打造成有投资回报预期的观光体验地,这在国内已有一些成功案例。但需警惕的是对其过度开发,但不利于保护,反而会使之变味变质。”

《人民的名义》收视率屡创纪录,编剧周梅森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

寻到伟大时代与转型社会的焊接点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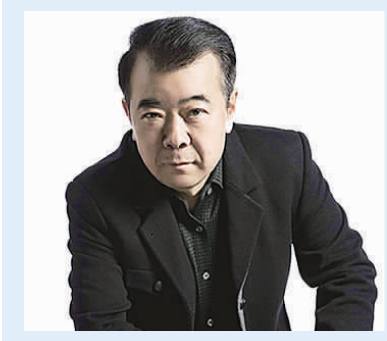
《人民的名义》第 19 集,剧中的反贪局局长把欧阳菁从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中带走时,现实中的收视率爆了。城市网的数据突破了 3。在那之前,2017 年城市网收视最高的 10 部电视剧,峰值不过 1.9,平均刚过 1。

“有工作人员注意到,收视最高时甚至接近春晚。还有人说,一些地方的餐饮业蒙受 30% 的损失,因为要赶在 7 点半前回家,很多人取消了外出用晚餐的计划。”在周梅森位于南京江北的工作室里,他打开手机,把微信群展示到记者面前。群里是宣传组分享的工作日报,包括前一天的收视率和网播量数据、实时微博热度、舆情监控等。客观数据之外,他的女儿还发来些直观的画面:年轻人在地铁上用手机观看这部剧,六七名旅途中人在高铁上围着一台平板电脑边看边讨论。

《人民的名义》与它的小说作者兼电视剧编剧周梅森一起彻底火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周梅森坦陈“真的没想到”。但转瞬,他为此种“意料之外”找到了“情理之中”——“国家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作家想阐释的世道人心,观众盼望的开诚布公,以及市场所谓的尺度、兴奋点,林林总总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我想我找到了。比起‘反腐题材’,我有更大的野心。我希望在观众、读者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大中国’的画卷,画卷里每一个人物,或许都是这个伟大时代与一些残酷现实间的焊接点。”

李达康写得最纠结,他的命运恰恰印刻着人性的复杂

严格意义上说,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在《人民的名义》里算男四号,他之前还排着反贪局长侯亮平、省委书记沙瑞金、公安厅长祁同伟。但按照网



络热度,“达康书记”无疑最火。面对这股穿越了代际文化“次元壁”的火热,周梅森先想到的是吴刚的演技,“早知道吴刚老师的戏那么好,我就该大大增加李达康的戏份,让他出现在每一集,坐稳男一号”。可细一回味,观众的兴奋点除了好演员,还在于角色本身的复杂性。

事实上,李达康几乎是周梅森在此部作品里写得最纠结的一个人物。按写作习惯,周梅森的小说没有提纲,不设结局,甚至没有人物小传,所有的角色都跟随故事的线索自然生长。“戏剧逻辑、复杂人性会推着人物向前走,找到他们各自的归宿。有时候,连我都控制不住。”李达康就是一个连作者都无法控制的剧中人。

已播出的剧集里,李达康将全副心思扑在了事业上,公正不阿,不以权谋私。但随着尘封往事揭开,观众渐渐看清他的另一面:开拓型的实干家,但也太过追求效率,希望自己的权力不受限制。已知的过去,因为太过追求效率,他的政绩蒙上了人命关天的阴影,是老搭档王大路替他扛下责任。至于未知的后续,“我跟观众一样,欣赏实干家李达康”。周梅森说:“可我们都知,凡是不受限制的权力,都已悄然埋下了悲剧的基因。如果有续集,李达康很有可能为了权力走上另一条道路。”

之所以有此伏笔,是周梅森在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后的结果。在检察院反贪局组织的座谈会上,他从大量活

周梅森说:“我借《人民的名义》书写了我对当代社会的一些感悟。虽然讲到了那么多问题,但我充分肯定,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是能给每个人带来机会的时代。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正处于最安定、最富裕的时代,它纵有许多毛病,但我们绝对不会否定时代的主流,这是我写作、也是剧组创作的基点。”

生生的腐败案例里发现一条规律:那些从高处跌落的干部,极少数是生性贪婪的,他们绝大多数是从一念之差撕开了第一道口子。“我写小说,就是为了从人性角度弄清楚腐化的诱因。人性,是书写的着力点。”在剧中各人物的身上,不仅有着周梅森对真实案例的取材和文学化,更深层的,是他对人性 and 世道人心的透视。如果读者、观众能以虚构的贪腐事件为标本,剖析他们不同选择背后的人生理念,并由此反观人生、反求诸己,这大抵便是《人民的名义》最大的价值所在。

郑西坡父子不可少,“大中国”画卷总有基层兄弟的一席之地

如果李达康是“网红”,那么剧中的郑西坡父子俨然最不受待见。父亲郑西坡为新大风厂四处奔走,落在观众眼里不过是社会政治大环境里的小杂音;儿子郑胜利那些投机的小伎俩,在反腐大局下更显得微不足道。不少观众直呼已见“只想观官场世相百态,不愿看生活一地鸡毛”。

周梅森理解观众,但他有他的坚持:“我是有野心的。我想全面地介入社会生活,写一幅‘大中国’的画卷,里面有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是我竭尽所能描绘的时代的本尊。”

既是时代本尊,那么官场之外,小人

物的生活不可或缺。这些小人物可能是他生命里遭遇过的人。周梅森的弟弟早早下岗,夜里替别人看小超市,加上退休金,一个月收入 1800 元。他的一个老同学,从 30 多岁开始摆煎饼摊,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如今看起来比周梅森苍老近 20 岁。生活里比比皆是的身影,都被纳入了《人民的名义》。

若是再回望来时路,周梅森自身何尝不是曾经的郑西坡?他在许多场合描述过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从一本残缺的《巴尔扎克传》开始。书里记述,巴尔扎克是个精力旺盛、百折不挠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曾沉浮南海,办过肥皂厂、印刷厂,但都以失败告终。而每每投资失败后,巴尔扎克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然后再投资、再写作,循环往复。仿佛有些宿命般,周梅森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几分影子,“我们都是被文学重构人生的写作者”。是文学引导着他顽强向前走,使他从矿山走向城市,让他从矿工周梅森,变为作家周梅森。

于是,被文学成就的周梅森每次看到同学好友,目睹他们在生活里挣扎奋斗的艰难身影,“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因此在我的小说,包括《人民的名义》里,总会有基层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

侯亮平承载理想主义,他代表每个人身边的正义与光明

不止一个人问过周梅森:侯亮平这

“刷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小说《地下铁道》将“双奖”收入囊中,中文版已引进出版

■本报记者 陈熙涵



科尔森·怀特黑德凭《地下铁道》获得普利策奖小说类大奖。(资料照片)

北京时间 4 月 11 日,2017 普利策奖在美国纽约揭晓。48 岁的黑人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凭《地下铁道》获得小说类大奖,跻身于福克纳、安·波特、厄普代克等少数同时将美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奖同时收入囊中的作家之列。

评委会认为,《地下铁道》巧妙地融合了现实主义与寓言性,将奴隶制的残酷和逃亡的戏剧化结合成为一段指向当代美国的传奇。据悉,《地下铁道》中文版已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获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的主创团队,将参与制作电视剧《地下铁道》,并在亚马逊平台播出。

《地下铁道》是科尔森·怀特黑德的第六部小说,也是他最受关注的作品。有评论认为,该书通过一个撕心裂肺的逃亡故事,写出了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刷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黑奴少女科拉逃往北方的奥德赛之旅,让我们看到了原始的勇气和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时刻。据悉,作家构思和创作这部长篇小说花了 16 年,去年 8 月甫一出版便大获好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脱口秀名嘴奥普拉·温弗瑞都将其视作私人珍藏。和许多一夜爆红、昙花一现的畅销小说不同,这部被称为“《追风筝的人》”之后再燃无数人阅读热情”的小说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始终活跃在前台。

“一旦你走出这一步,你必须得去期待前头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即使你现在的生活是如此悲惨,你几乎无法想象。就算在现实生活中,你处在一种毫无希望的悲惨境地,你也得去相信会有更好的

东西、一个可供你喘息的地方的存在,否则你永远无法迈出第一步。”在美国历史上,“地下铁道”指的是美国废奴运动时期的一个从南方蓄奴州向北方自由州和加拿大输送奴隶的网络,它由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内的废奴主义者秘密搭建。而在怀特黑德的小说中,“地下铁道”则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铁路系统。

《地下铁道》讲述了 19 世纪美国内战爆发前,黑奴科拉经由“地下铁道”逃离南方追寻自由的故事:在佐治亚庄园上,无家可归的奴隶少女科拉,遭受欺辱和强暴,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在又一次受到主人的鞭打后,她决心与朋友西泽一起逃出人间地狱,搭乘传说中的秘密“地下铁道”一路向北,奔向自由。科拉和西泽一路遭遇艰难险阻,他们躲过凶残的围捕,牺牲了无辜的同伴,终于找到了“地下铁道”的入口,在站台人员的友好帮助下,登上一班不知道会停靠在哪儿的火车。穿过幽暗的森林和沼泽,火车停在不同的“站点”,从北卡罗来纳州,穿过田纳西、印第安纳,行至更远处,一路上科拉目睹了美国社会的黑暗、法律的不公、暴力的无处不在,帮助她的好心人一个个倒下,而那个身高两米、冷酷无情的猎奴者仍紧追不舍……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中,“地下铁道”是种比喻,指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的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延伸至美国 14 个州及加拿大,逃亡中的“停站点”叫“站台”,负责协助工作的叫“列车员”,“列车员”帮助黑奴躲避追捕的“猎手”,并不存在一条真的“地下的铁道”。

那么,为何要将这一种比喻意义上的“地下铁道”变成小说中的现实铁

呢?怀特黑德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将隐喻变成现实这个念头是整部书的灵感,也是他写作的初衷,多年前在写另一本书时,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问题:如果“地下铁道”是真正的铁路,那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主人公沿着“地下铁道”一路北上,穿过每一个州,而每个州又代表着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同的可能性,这样的话,美国的历史就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启……这个想法成了这部小说最初的构思。

2000 年,小说开始写这个故事,一开始主人公是一个男人独自一人,后来变成一个寻找孩子的人和寻找父母的孩子。16 年后,一个少女借助这条“地下铁道”,像哥伦布周游列国一样在各个州之间见识种种不公与荒诞的故事终于成型。此外,作家还透露,“地下铁道”对于现实世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存在于地下,漆黑一团,代表着与上层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

1969 年出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科尔森·怀特黑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目前他是《纽约时报杂志》的专栏作家。1999 年,怀特黑德的处女作《直觉主义者》被提名笔会/海明威奖的终选名单。时隔两年,他的《约翰·亨利时代》入围普利策奖的决选名单,写这本书让怀特黑德萌生了创作《地下铁道》的冲动。

在美国接受采访时,科尔森·怀特黑德说:“当我在写作时,试图想清楚某件事情,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的,是我一直以来给自己的设问。写作成为了一种帮我寻求一些真相的方式。”